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杨玉珍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关键词]魏晋玄学;文人气质;思维方式;诗意人生;出处;山水情怀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08)04-0044-04

中国文人的气质向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中国文人一直以来都以一种独特的气韵和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的文坛,总显得那么不同流俗,他们清醒、高洁、感性、傲世、敏感、多情,有那么一点点孤芳自赏,又有那么一点点顾影自怜,他们是痛苦和矛盾的化身,又是才情和思辨的最佳结合体。深究这其中的原因,必然有其深层的社会基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特有的这些东西不断地在文人身上累积,最终形成了中国文人的独特气质。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中国文人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可谓对中国文人的精神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中国文人性格的很多因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和根据。本文试从魏晋玄学入手,来分析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魏晋玄学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

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具影响的思潮之一,它同先秦的诸子之学、汉代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这张美丽的画卷。而魏晋玄学凭借其重思辨和好玄远的特质,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一个全新的时代。它以其思辨精密、逻辑严谨之特点,纠正了两汉经学之流弊,弥补了原始儒学不重视思辨的欠缺,开始向着抽象和理性的方向发展,为中国文人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提供了理论源头。

魏晋玄学以崇尚清谈而闻名于世,清谈成为文人士族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也成为较量他们逻辑思维能力的最好战场。清谈由汉末的清议发展而来,清议是汉末的名士为了政治上的要求,为朝廷辟用人才提供自己的意见支持;而魏晋清谈则不同,清谈脱离了和现实政治相关的功利目的,所谈内容以玄远虚无的老庄为主,精神上渐趋浪漫瑰丽,内容上也愈加漫无边际,但散漫之中也有集中探讨的主题。虽然魏晋玄谈的品题有很多,如“才性之辩”、“圣人无情无情之

辩”、“声无哀乐之辩”、“言意之辩”等等,但是“本末有无之辩”始终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品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中所指出的:“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辩。”^[1]自从何晏、王弼提出“贵无说”,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来源于“无”,“本末有无”问题就成为玄谈一个重要的品题。所谓“本末有无之辩”,就是探讨天地万物、森罗万象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如果有的话,这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是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还是无形无象、没有任何具体规定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天地万物的根本是“有”还是“无”?围绕这一主题,针对何晏和王弼提出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裴頠补偏就弊,又提出“崇有论”,郭象则完成了贵无论和崇有论两者的融通,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如果说先秦哲学特别是两汉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还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那么魏晋玄学讨论的则是宇宙本体论的问题,就是要为天地万物(包括政治人伦)的存在找一形而上根据。这些问题的提出,自然会丰富哲学思想的内容,使人们不仅注意宇宙是如此的存在,而且要去探究宇宙为何如此存在,如此存在有什么根据等等。对如此之类形而上问题之思索,必然能增强魏晋人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使他们的思维更加严谨缜密。

此时,对“天人之际”的讨论也是当时热衷的主题。《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讲到王弼时,说王弼年轻时,和何晏见面,晏时为吏部尚书,对王弼十分称赞,说:“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可见,当时玄学家不仅热衷于探究宇宙万物和人生的终极来源和出处,天道和人事之关系也是他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宗白华先生在《清谈与析理》一文中所指出:“‘究天人之际’是当时魏晋人‘共谈析理’的最后目标。”

除此之外,“言意之辩”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品题,它不仅使人们开始思考“言”和“意”、“形”和“神”、“道”和“道”之载体的关系,而且逐渐发展成清谈的一种方法,成为魏晋及其以后一个长久不衰的研究主题,并对中国文论、画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有这些玄谈品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使他们开始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

题,不再像汉代那样只注重政治人伦和王道秩序,注重名物的考辨和训诂,把天人关系归结为天人感应,用蛊惑人心的谶纬之学解释人和天、宇宙和自然的关系。魏晋士人已经使中国哲学从具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群体思维的状态中超越出来,开始认真的思考个人的生存空间,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思考宇宙的由来和根据,思考时间的流逝和过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人士族的想象空间,既启迪了他们的智慧和思维,又为以后中国人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提供了理论源头和保障。

二

魏晋玄学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

这里的“诗意的人生”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文人士大夫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纵情适性,寻求精神的自由和超脱;二是指他们从现实压抑的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由政治的人生转向生活的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极其黑暗的年代,但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们在强权政治的压迫下,在政权走马灯式的更替中,目睹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转瞬即逝,一场又一场人间的悲欢离合。面对纷繁的世事、血腥的斗争、无情的现实,如何超越有限的人生,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无限的生命价值,实现圆满的人生,这成为士人们思考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思潮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寻求自由人生的热情。随着对个体生命的不断追求,个体情性解放的不断深入,玄学理论的真谛——返归自然的特质,愈来愈为士人们所把握,致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求得“诗意地栖居”,不仅成为哲学家的一种人生向往,也成为他们终身努力的目标,沉浸于老庄的迷蒙绚丽的人间仙境中,可以使魏晋士人暂时忘却现实的纷争和人间世的烦恼。

老子和庄子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为后人描绘出一种世外桃源式的人间仙境,他们追求清静无为的人生、希望远离凡俗尘世的困扰,在自己的内心中构建出一片人间天堂。随着魏晋士人们对老庄作品的精读和研透,老庄作品里所描绘出的那种人间仙境越来越吸引着他们的心智,他们流连于世间,忘情于山水,开始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士人们在对“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解读中,不仅领略了自由超脱的人生之道,也受到了深厚博大的美的洗礼,可以说,充满浪漫色彩的玄学既启迪了中国人“诗意栖居”文明梦幻的人生理想,同时也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为后人精神境界的培育和养成奠定了基础。

玄学的基本要义是强调主体精神的自由,达到庄子所说的那种“无凭无恃”的审美境界。魏晋士人深谙其道,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代的时代特性,那就是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追求感情的收放自如。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魏晋时代是一个“社会秩序大解体,旧礼教总崩溃的时代”,它的特点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和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时代”。这个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之前的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它之后的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

思想上又入于儒、道、佛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的伟大时代。^[2]

追求精神的自由,首先表现在对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不加伪饰,《世说新语》中这类的故事有很多。如在《伤逝》一篇中写到,“王仲宣好驴鸣,既丧,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因为王粲喜欢听驴叫,曹丕竟然让前来吊唁他的人都学一声驴叫送给他。再如“顾彦先,平生好琴,即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悼唁的人竟然爬到死人的灵床上去鼓琴,最后又对守灵的孝子不理不睬,确是真情流露,一切礼法习俗都不顾了!阮籍的母亲去世,他完全不顾世俗礼仪,“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穴永诀,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喝酒、吃肉只是表面形式,与阮籍内心椎心泣血的悲恸并不对立!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礼法之类就不是为他那样的人而设的。有一次他和即将回娘家的嫂嫂告别,有人以“叔嫂不通问”的礼法来讥诮他,他干脆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耶?”类似这样的故事,也许我们现在听起来有些荒诞,但是对当时的士人来说,却是他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没有半点伪饰。

另外,追求精神的自由,还表现在魏晋士人崇尚自然,追求逍遥放达,不受传统礼法的束缚,敢于做真正的自己。《世说新语·品藻》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宁作我”,就是要突出自己与众人不同的个性,做出真实的自己。再如《世说新语·雅量》中,都太傅要找个女婿,遂遣门生送信到丞相王导家去求亲,王导让来人自己去东厢房随便挑选。门生回来报告都太傅说:“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都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这个坦腹东床的人,正是王羲之(号逸少),他对到豪门贵族当女婿的事毫不动心,依然坦腹高卧,如此不计名利,也不装腔作势,正反应了魏晋士人真正的精神风貌。

魏晋玄学对士人的影响不仅在于人格性情方面,而且在于人生态度、处世原则方面,它使士人的生活从政治转向人生,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而真正实现了自身人格的完善。处于社会动荡中的魏晋玄学家们始终面临着国家政治的动荡与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间的高度紧张的关系,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极力要在政治与人生、名教与自然之间寻求某种和解,但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却最终将他们所关注的主题从政治问题转向了人生问题。在一个国家政局不稳、战乱频繁的年代,人们往往会以一种深切的情怀去思考作为个体的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问题。对于魏晋玄学家来说,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要为人生本身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一个能在社会与人生的变幻无常之中可以守望的精神家园。所以他们寄情于老庄,钟情于山水,在闲适逍遥中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如果说两汉及以前的士人还在为政治的目的而孜孜以求,为政治而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怀抱,那么魏晋时代的士人则真正把自己关注的焦点转为人生问题,在作品中也开始抒发自己的一己之情,如阮籍的《咏怀诗》、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娇女诗》,他们所关注的个人问题要远远

大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沉浸在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勇敢的抛却现实的烦恼,不在现实的政治中苦苦挣扎,而是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任性逍遥,怡然自得。

这样的人生特点,这样的处世态度,对以后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当他们人生不得志的时候,他们往往能找到另外一片精神家园,在其中自得其乐,或隐居山林,或归隐田园,而不会执拗的坚守在使他们痛苦和彷徨的政治土地上。适时的时候异地而居,在他们选择的这一片逍遥乐土中,自得其乐,自适其情,过一种诗意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吗?

三

魏晋玄学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进和退、出和处,历来被认为是旧时读书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抉择。一边是通达仕途、兼善天下,一边则是高隐江湖、独善其身;一边是运筹帷幄、决策庙堂,一边则是不问国事、忘情诗酒。以儒家为代表的“出”和以道家为代表的“处”真的是难以调和的吗?“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丧家之犬”(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的孔子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出自《庄子·人间世》)的庄子,真是像人们一向认为的那样纯粹对立而毫无共通之处吗?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解答,也有很多人以身试法,妄图在“出”和“处”之间找到一种两全的方法,也许只有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让徘徊于出处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所以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认为人生在世就应该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有益于社会的人。而道家以道为本,崇尚自然,反对社会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侵蚀和异化。道家认为,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在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上,而是在生命存在的本身,生命的存在,而且是不受任何外在条件异化的自然的存在,才是生命最根本的意义与价值。所以道家一概反对儒家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的生命价值观,而采取养生、全生之策,使生命不受戕害,不被异化。^[3]可见,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儒家和道家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可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却试图调和儒家和道家的矛盾,他们必然会在“出”和“处”之间找到一种两全的方法。

出与处是中国士人处世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士人出处的人生道路选择,一方面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与士人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选择有关。从时代背景来看,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比魏晋更嘈杂、更混乱、更黑暗了,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残杀异己、阴谋篡权,这些导致社会混乱的因素在魏晋哪样都不少;而作为已经觉醒的个体——士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肯定是终身如履薄冰,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样,他们便急于在社会中找一个全身养性的避难之所,而山林隐逸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可是身处乱世,如果人人只求自身为安,而弃国家存亡于不顾,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儒家传统道德千年来的耳濡目染已使他们把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观念召唤着他们为国家

的兴亡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所以有些人挺身而出,尽管所事非君子,但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但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纷繁世事中又使他们时刻充满着死亡的恐惧和困于冗事难以脱身的烦扰,因此,他们徘徊在人生痛苦和绝望的边缘,郁郁寡欢,毫无人生乐趣可言。所以,在儒道之间、在出仕和隐逸之间找一种调和的方法,已经刻不容缓,成为当务之急。玄学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矛盾。玄学作为以道统儒的理论体系,是以道家的老庄哲学来改造儒家的伦理哲学,既否定儒家的经典地位,又以儒学为基础发展了道家的寻求精神自由超脱之大义,在儒道之间找到一条调和的途径,让文人士族既能兼顾庙堂之上的国家事务,又能修身养性,心处玄远,在老庄和山水天地中寻求自适,消解人生的痛苦与无奈,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这样的士人在魏晋不乏其人,东晋的王导和谢安就是很好的例子。王导自幼恬淡乐道,企慕正始之音。永嘉之乱,大批士人迁居江南,玄风也随之南渡,王导是东晋初期清谈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可是,王导对东晋的稳定和发展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说到:“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4]可见王导是既宅心玄远又有具体事功的典型代表。东晋谢安也延续了他的这种风格。谢安在东山隐居二十余年,以无用为心,以出为劣,以处为优,四十岁才入仕。入仕之后,仍然过着与名僧、高士优游山水、谈理属文的生活;但是同时,谢安也有许多的政绩,他延续了王导老庄无为的为政之道,使东晋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太平无事。东晋士人大多有一段先隐后仕的经历,所以在入仕后,既能体玄识远,宅心尘外,又能无为而治,以享事功。这种宅心玄远与具体事功兼有的士人形态成为后世士人安顿身心的一个参照,也对后世士人心态和士人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宋代的苏轼和朱熹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存在,原本无意于仕宦,但因他们不忘社会责任,出仕后能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四

玄学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家以道为本,崇尚自然,这可能是中国文人都对自然怀有如此之深切感情的最初原因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山水钟灵毓秀、风情万种,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喜欢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吟哦歌咏。孔子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给自然加上了一层道德的色彩,就更使山水成为文人学士钟情的对象。美丽的山水与多情的文人结合便产生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中国文学的典型特色。

文人自古就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自然有人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巨大而深沉的影响。当中国历史发展到魏晋这一时期,玄学的出现使山水与文人的关系更近了一层,玄学在文人名士崇尚自然以及最终走向山水田园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文人和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内在一致性呢?我们从对魏晋玄学的分析中就可以窥见一斑。

玄学是以道统儒、儒道互补的学说,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已经在人和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崇尚自然的本性更是由来已久。《老子》中虽没有直接言及自然山水的篇章,但其自然观所描述的返朴归真境界已显示出与自然界的亲近思想。《庄子》进一步阐发老子的自然观,通过描述理想人格形象如“神人”、“真人”与山林的密切关系,阐明了人寄意于“广漠之野”、投身自然中去就能体验和实现其玄奥的“道”的内涵。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尤其是玄学家们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挖掘和表现,玄学那套“得意忘象”、“寄言出意”的思辨方式被广泛运用,在形神互为关联的思维启示下,自然山水作为外在的“形”与无所不在的无形玄奥之“道”的内在关系也被格式化地纳入魏晋人的认知体系。据此他们认为,自然山水本身聚集了无所不在的“道”,山水中包含了玄理,山水本身就是“道”的体现,游山玩水便是以有“形”之举去感悟无形之“道”。因而山水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文精神色彩而在魏晋士大夫精神生活中起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如阮籍就认为:“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5]宗炳的《画山水序》所论也颇具代表性:“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川,质而有趣灵。……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6]所谓“质而有趣灵”明确肯定了自然山水的感性形象之美在于它是“灵”、“道”的外在表现;“以形媚道”则是指山水以其形貌之美使“道”显得更为妩媚,山水也能成为贤者“澄怀味象”的对象。所以,在魏晋士人那里,山水可以被看

作“道”的载体,是人和“道”之间沟通的桥梁和中介,钟情山水,就是钟情体玄悟道;越是和山水亲近,和“道”的境界之间的距离就越近。如果了解了这些,历史上的这些问题便不难理解了;即魏晋玄学之后山水田园诗的大量产生以及长久地流传;山水画一直占据着中国画的主流并成为中国画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争相过着一种田园隐逸的生活;士人大多以出世为优,以入世为劣……

正因为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与文人之间建立起的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山水便逐渐发展为承载不同文化意义的物质性对象,再加上后来山水田园的诗化、人格化、人性化,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对应关系日益强化并固定下来,自然界中的很多自然客体也具有了主体性的含义,如梅花的高洁,竹子的峻拔,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等等。自然景物的人格化使文人把自然界中的景物引为他们的知己、倾诉的对象,所以,当仕途文人遭遇坎坷挫折,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到大自然中寻求安慰,过一种隐居不仕的生活,因此钟情山水、隐居山林也成为很多文人的理想,陶渊明、谢灵运、王维等这些伟大诗人的出现更是为中国的山水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宗白华. 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70-71.
- [3]詹福瑞. 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儒道生命观[J]. 中国文化研究, 2003, (3):
- [4]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7.
- [5]阮籍. 阮籍集·达庄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2.
- [6]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75.

[责任编辑:王云江]

The influence of metaphy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on the temperament of Chinese scholars

YANG Yu-zhen

(College of A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temperament of Chinese scholar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scholar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etaphy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ulding the temperament of Chinese scholars. The influence mainly manifest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it influences scholars' mode of thinking and trains their ability of abstract thinking, making them form the habit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speculation, being fond of reason; 2) it enlightens scholars to get away from the trivial and depressing real world to pursue life full of poetic conception; 3) it provides scholar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onfucian in solving problems and makes them wander about freely; 4) it cultivates scholars' anchoretic feeling and find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for Chinese scholars' fond of landscape poetry and landscape painting.

Key words: metaphy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temperament of scholars; mode of thinking; life full of poetic conception; provenance; fond of landscape